

浙江历代文学家评传丛书

徐文长评传

骆玉明

贺圣遂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7065

序

章培恆

明代后期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特异的存
在，因为在当时出现了一股新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
学潮流，其主要特征似可归纳为尊重个性和人欲。它
对于直到那时为止的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文学观念，起
着猛烈的冲击作用。毫无疑问，这是元、明时期逐渐
发展起来的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方
面的反映，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前进趋势。在一段时期
里，它颇有突飞猛进之概，但到了明末，尤其到了清
初，它的势头由放慢而停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走了
回头路。直到清代乾隆时期，才回到正常的轨道，出
现了曹雪芹、袁枚和稍后的龚自珍。研究这一文学潮
流及其受挫折的前因后果，乃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对
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性将有很大助益。然而
就今天来说，这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徐渭（文长）是这一潮流的早期代表之一，在他
身上以及他的文艺作品中鲜明地体现出异端的精神。
而且，到晚明时期，他更被这一潮流的领袖人物之
一、“性灵说”的创始者袁宏道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学
创作的旗帜来推崇。因此，徐渭研究是明代后期文学

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然而，这工作在今天同样处于起步的阶段。从徐渭的家世到徐渭的思想，都还有许多以前的论著所不曾触及或没有弄清楚的地方。

在这样的情况下，读到路玉明同志和贺圣遂同志合著的《徐文长评传》，不由感到衷心的喜悦。

这部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却是作者在对明代后期的社会情况、思想情况、文学情况进行多方面的认真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我们不但可以由此窥见其时代风貌的大致轮廓，而且还可以看到徐渭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中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也可以说，通过作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一员的徐渭的经历，本书从若干侧面显示了这股潮流与整个社会的紧密联系。

不过，徐渭既是这潮流中的一分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弄潮儿的共性，同时他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其独特的生活道路的人，共性仅仅存在于其特殊的个性之中。忽略了这一点，徐渭就不过是某些思想的符号，不再是活生生的人了。作者对这一点是充分理解的。他们追求的目标，正是再现徐渭的个性。从书中所写的徐渭的世系、他的受压抑的童年、不得志的青壮年时期直到佗傺的晚年，在在都表现出徐渭个性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表现出那在总体上压迫人的社会环境与要求尊重个性的新思潮的矛盾冲突，是怎样通过徐渭的个人遭遇而在他性格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他成为狂放而又神经质的人。写人物

传记，这是一种不容易达到的境界。

对徐渭家世、生平方面一些重要问题的考索，对徐渭思想渊源的探讨，作者也花了许多精力，因而书中有不少发前人所未发或纠正前人疏误之处。这也是本书的突出优点之一。

为了适应更多的读者，本书的文笔是轻松而引人入胜的，但在其根柢上，却具有令人注目的学术性。这就是我在读完本书以后一个最强烈的印象。当然，由于我跟骆、贺二位都是朋友，我的看法也许不很客观，也即难免有溢美之处，那么，还是请读者自己对这部书的价值作出客观的判断吧。

一九八五年五月于复旦大学

目 次

序

章培恒

一、引言	1
二、家世与少年时代	5
三、在市民文艺的氛围中	21
四、探寻人生之路	39
五、抗倭风云与文学的成熟	58
六、戎幕生涯的得意与苦恼	89
七、几度风雪几度梅	111
八、漫游江浙地 创作《四声猿》	134
九、塞上和平曲 京师恩怨情	161
十、贫病晚景 艺文余年	189
十一、多方面的成就与广泛的影响	225
附：徐渭生平与主要创作简表	238
后记	255

DB18/1

一 引 言

在中国历史上，向来不乏多才多艺的文士。但像徐渭（文长）那样，在许多领域里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就诗歌而言，晚明公安派的领袖袁中郎（宏道）对他推崇备至。中郎于徐渭去世六年后第一次在会稽友人陶望龄的家中读到他的诗集《阙编》，不觉惊骇跃起，叹为奇绝，在灯影下诵读叫嚣，不能自持。此后袁中郎逢人必说徐文长，称之为明代第一诗人。在戏剧领域内，徐渭的《四声猿》剧和他的戏剧理论，标志了明代戏剧的重要转折，直接影响了汤显祖等优秀作家。汤显祖曾经十分钦佩地说：“《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①至于绘画，他也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郑板桥对徐渭深为倾慕，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②（“青藤”是徐渭的号）。齐白石在一首诗里也说：“青藤、雪个（朱耷）远凡胎，缶老（吴昌硕）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此外，徐渭的散文和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又是一个富有军事才能的杰出的智囊人物。

然而徐渭的一生却是坎坷而痛苦的。他有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报国愿望，可是好不容易才弄到手一顶秀才头巾，连考了八次，也不曾中举。他生性狂傲，蔑视礼法，把个人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和任何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打交道，都要求保持平等的态度，绝不肯屈己于人。但是在封建制度的大网中腾扑冲撞，结果被逼得发了精神病，又由于病中杀妻而坐了七年牢。晚年他靠卖字画甚至卖书卖衣度日，终于潦倒而死。不过，也正因为始终只是一个平民，经常与封建政治制度和封建道德传统处于对抗的地位，他的文学和艺术创作才如此强烈地闪现出个性的光芒。

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总不是孤独地来到世界上的。不必仔细寻找，我们在徐渭前后相近的时期里，就可以发现许多在精神气质上与他或多或少地相类似的人物：唐伯虎、祝枝山、李卓吾、袁中郎、汤显祖、冯梦龙，以及前后七子中的一些人。再往后推，则有王思任、张岱，以及清代的金圣叹、郑板桥等等。当然他们是各各相异的，甚至彼此间不免相互攻讦，但他们却汇成一股时代的潮流。在迷蒙与矛盾之中，或是顽强或是软弱地企图摆脱封建道德传统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自由与平等。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像徐渭一样，在强大传统势力的压迫和自身矛盾的纠缠下，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以至显出狂态。

这是一个无比精辟的论断——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个人的矛盾往往源

于社会的矛盾，个人的痛苦每常源于历史的痛苦。

明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一方面，自元代以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到明中期以后，就生发出旺盛的资本主义萌芽。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社会阶层，自然产生出新的人生观念，新的道德理想，以及新的文学要求。然而这一种萌芽却面临着艰难的环境，它始终受到封建生产方式的压迫，不能占取主导的地位。特别是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受到强大的封建思想和道德传统的压迫尤为剧烈，使它没有发展成能够壁垒鲜明地与之作两军对阵的力量。好像一只已经蜕化出来的蚕蛾咬不破结得过于厚实的茧，整个社会，尤其是像徐渭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充满了兴奋、焦躁、矛盾，有时是绝望的情绪。他们力图证明人的情欲和物质占有欲具有天然合理性，反对封建势力对市民阶层所追求的人性的桎梏，却又遮遮掩掩，千方百计要给自己的货色贴上旧的道德教义的商标；他们强调个人的尊严，反对封建等级秩序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层层压迫，却又一心指望在那宝塔形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占据较高的地位。

于是我们看到明代有许多奇怪的现象：政治的腐败与经济的繁荣并存；维护正统的斗士与反传统的叛逆挂着同样的招牌；一面是表彰贞妇烈女的酸腐文字空前增多，另一面是反映男女情爱、甚至不无病态地描摹男女私事的作品大量涌现；极度热心于科举的士

子，同时对八股深恶痛绝……。这一切使喜欢偏执一端的人们往往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但不管怎么说，明代的历史有重要的进步——尽管它步履艰难；明代的文学艺术也闪耀着前所未有的光辉——尽管它光怪陆离。我们理应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晚明是明代具有新的时代色彩的文学艺术蓬勃发展，取得卓越成就的时期。徐渭则是晚明文学艺术的一代先驱。

言归正传。下面，我们就从头说起。

①《王季重十种·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

②袁枚《随园诗话》。

③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页）。

二、家世与少年时代

浙江绍兴，这是一座古老的历史与文化名城。在城外，它的东南有会稽山，自古相传，大禹治水告成后曾在这里汇集诸侯计功封爵，禹死后也葬在这座山中。西南有兰亭，是东晋名士王羲之等人修禊事的地方，那一篇《兰亭集序》，使人想见他们清俊疏朗的风骨。城西鉴湖的风光，过去曾经久负盛名，如今湖面已经狭如河道，但旧日的情韵还依稀可辨。群山疏落相衔，秀媚娟丽，水流清澈映碧，娴静而温柔，真所谓山水自来亲人。城内的府山（旧名卧龙山），据说是古越王宫的所在地。越人卧薪尝胆，含垢忍辱，生聚教训，复仇兴国，演出了历史上极其悲壮动人的一幕。沈园也在城内，剩得一口池塘，几株衰木。它教人想起陆放翁无论对国家和民族，还是对被迫离弃的妻子，都是那样一往情深，固执难舍。绍兴这一块土地上，发生过多少令人心摇神往的故事！更使人惊叹的是，她一代一代竟然孕育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徐文长就是他们当中为人传颂、妇孺皆知而平民色彩特别鲜明的一个。

在明代，这里是绍兴府治和山阴、会稽县城的所

在地。大致今天绍兴市的西部为山阴，东部为会稽，府署在山阴境内。山阴城内偏南的地方，有一处叫大云坊，坊内有一条街称为观巷，徐渭的故宅就在这里，它傍靠着一座叫大乘庵的寺庙。今天我们到绍兴去访徐渭纪念馆“青藤书屋”，会发现周围的地名还保存着明代的痕迹。青藤书屋的前后两条街分别叫作“前观巷”和“后观巷”，它面前的一条小路则叫作“大乘弄”。明代末年，画家陈洪绶（老莲）买下了徐渭的故宅，命名为青藤书屋，以寓纪念。它迭经兴废，历数百年风云变幻，依旧保存，维系着后人对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怀思。只是这所故宅早在徐渭年青时就被乡里豪绅夺去，它的内部建构早已不是原来面貌。现在我们看到的被称为徐渭遗迹的东西，大抵都是后人附会出来的。一般所谓名人遗迹多是如此，徐渭故居至少还是原址，这就难能可贵了。

徐渭出生于明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1521年3月12日），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他一生用过许多别号，最常用的是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是把“渭”字拆开。“天池”和“青藤”，通常的说法是，前者原指徐家故宅里的一口水池，后者指庭院中徐渭手植的一棵藤木。这说法虽然在明末就已形成，而且从未有人怀疑过，其实并不可靠。关于“天池”一号的用义，徐渭在《天池号篇为赵君赋》诗中这样说过：“予耽庄叟言真诞，子爱江郎石更奇。诂意取为双别号，遂令人唤两天池。”这

里明白指出。徐渭自己以“天池”为号，是借用庄子《逍遥游》中“南冥者，天池也”一句，寓含大鹏鸟逍遥于天地之间的意思。“青藤”取于何意，我们不太清楚。但各种资料都说明这个号是徐渭中年以后才用的^①。而徐渭二十岁就离开了家，二十五岁故宅易姓，他就再也不曾回去过。所以可以推断它和故宅之物没有什么关系。合理的解释是，后人为了纪念徐渭，才根据他的号在他的故宅中添设了“天池”和“青藤”二物。这就象过去在曲阜附近有所谓“子在川上处”，在泰山上有所谓“孔子小天下处”一样。

关于徐渭的家世，过去的一些著作中有许多含糊与错误之处。我们对此尽力作了一番考证，得到的结果大致如下^②：

徐家世代居于山阴。明代以前的情况，我们没有找到线索。关于明初的先祖，徐渭《从子国用至自军中》一诗曾经这样叙述：

高皇得大物，创始日不暇，草草约三章，未及
详误讫。吾宗本掾流，困书出休假，干轨苦不多，
负戈蒙绛帕。远戍至夜郎，履屐趋传舍，终年苦肩
臂，幸不死戎马。

开头四句，意思说明初刑法疏略，对于“误讫”（被他人所牵连、耽误）一类案情缺乏详细的规定。第五至八句，说他的先祖本是地方上的掾吏，因为困于书牍而休假。大约就是在休假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追究责任，他也被牵连进去。他“干轨”（触犯

法律)虽然不多,却被发配充军。第九、十两句,说他的先人被遣发到贵州,在驿站从事扛运之役,备尝劳苦,但幸好没有死在战场。

明太祖和成祖时期,在军事上建立了卫所制度。这是在全国沿边地带划定若干防区,称作“卫”,卫下设所。卫所的军士编入军籍,他们的后人必须每一代抽出一个人当兵。最初的军籍人员,不是穷苦至极的百姓,就是犯法的罪徒。徐家的先祖就属于后一类。因为这位先祖的关系,徐渭一家也就世袭为军籍,隶属贵州龙里卫。但实际当兵的,是与他们同宗的另一支,徐渭称为“军中之系”。不过徐渭一生喜欢谈论军事,热衷于谋划方略,也许和他家的军籍身份有一些关系。

从上面说的情况来看,徐家的社会地位原来很低。这种状况到了徐渭前几代有了改变。徐渭在《赠族兄序》中夸耀说:

自吾祖而上,代多豪隽富贵老寿之人。至吾考,若新河五叔父、西河二叔父诸君子,或为州郡,或自部郎,俱阶大夫,横黄金。而子孙亦繁多,大其门户,美其衣食,高者以明经为生员,次亦以气概雄视一乡。

不过徐家的门第并不算怎么光大。根据徐渭在《二兄配冯太孺人生日序》中叙述,整个徐氏宗族在到徐渭这一辈为止的二百多年中,成为秀才的是“以十计”,其中考上举人的只有四个,没有人考上进

士。而且这四个成为举人因而获得做官资格的都是徐渭的父辈，这也说明徐家发达的历史并不长。

徐渭父辈的仕宦情况是这样：徐氏一族在山阴分为两支。本支中，徐渭的父亲徐锺于弘治二年利用贵州军籍在云南中举（明嘉靖十六年以前，云、贵两省乡试合并于云南），随后在云南历任州县官，正德七年升任四川夔州府同知，几年后退休还乡^③。徐锺的弟弟徐镗，即前面引文中提到的“新河五叔父”（新河是山阴城里的坊名，现在绍兴市还有一条街叫新河弄），他于成化十六年中举，也是在正德年间做到福建邵武府的同知^④。另一支中，徐渭的族叔徐冕，即前文中提到的“西河二叔父”（西河亦为山阴坊名），他于弘治五年中举，曾任宝应县令，最后做到刑部郎中^⑤。府同知和部郎中都是正五品，按照明人的习惯刚刚够得上称为“大夫”，所以徐渭夸耀他们“俱阶大夫，横黄金”。第四位中过举的是谁就无法查明了，他的官阶肯定没有达到五品，否则徐渭也会在《赠族兄序》中一起提到的。徐锺和徐镗两家到徐渭这一辈就完全衰微了，再没有人做过官。徐冕的孙子徐桓到万历八年中了进士，初任丹徒县令，徙给事中（终官不详），官运稍为亨通^⑥。但那时徐渭已到晚年，而且两家的关系也颇为疏远。

就以上情况来看，徐家原是普通的平民家庭，后来成为富裕的市民，到徐渭的父辈上升到中下层官僚的地位，然后很快又衰败下去。说他们是绍兴城内的

“名门望族”，这完全不对头。

徐鏞字克平，生性喜竹，自称“竹庵主人”。原配童氏，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徐淮，比徐渭年长二十九岁，次子徐潞，比徐渭年长二十岁。童夫人死在云南。后来徐鏞又娶了云南一个低级武官家里守寡的侄女苗氏为妻，没有生育。正德末年，徐鏞退休回山阴，和一个婢妾生下了徐渭，在他出生一百天后，徐鏞就去世了。徐渭生母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极少。徐渭称她为“苗君”，她恐怕并不是恰巧与主母苗夫人同姓，而是苗家的陪嫁丫头，即旧时所谓“媵女”。万历《新昌县志》叙及当地风俗，说：“士民概以媵女为妾。”新昌也属于绍兴府，与山阴相近，两地的风俗也是差不多的。

徐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与商业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强调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商人虽然有钱，社会地位却很低。两汉时，要打仗了，就抓商人去当兵。我们读白居易的《琵琶行》，那一位长安名妓“老大嫁作商人妇”，无论在她自己还是在白居易，都觉得这是一桩很可悲的事情——尽管妓女的社会地位也很低。这一句诗所包含的辛酸意味，恐怕现代人不大容易体会得到。这种状况到了宋代开始有所改变，经元入明，尤其到了明中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时在政治上已经消除了对商人的歧视，商家子弟一样可以应科举做官。明代有许多富贵人家就是从平民爬上来的，由财产的积累转入文化的积累，而后成为统

治阶层的人物。嘉靖时期做到吏部尚书的张瀚，其祖上以一张织布机起家，这是很有名的例子。他们原本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作凭依，也始终不讳言对于财富的兴趣。由于商业发达，由经商致富的现象大量存在，整个社会已经大体上改变了对商人的看法。有些人家甚至不愿意自己的子弟从读书立身而宁愿去经商，一般的地主甚至官僚同时兼营商业的情况也所在多有。举一个例子，戏剧家陈与郊就曾一面做官，一面贩盐。徐渭家是否从商业发达起来的，虽没有明确的根据，但徐家的长子徐淮并没有走读书做官的道路而去经商，徐铤前妻童氏的母家也是商人家庭，而且徐渭本人到晚年也曾和儿子一起在北京做过生意，这至少说明他们的家庭有着经商的传统。所以无论从社会还是从家庭而言，徐渭都是生长于一个矛盾交杂的环境中。

当徐渭年幼时，他的家庭已经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徐铤去世了，童夫人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年并娶亲成家，作为主母而只比徐淮大十多岁的苗夫人根本支配不了他们，彼此之间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徐淮是一个生性散宕、不切实务的公子，父亲死后，他就一直携资云游四海，一面经商，一面求仙炼丹。炼丹是很费钱的玩艺，经商不善必然亏本，所以没有几年，他就耗尽了几千两银子的资财，把家搞穷了。这样，苗夫人和长子长媳的关系就越发紧张。徐渭的生母原是一个婢女，成为妾也并不改变其奴隶身份，在

家庭内当然毫无地位可言。徐渭自己作为庶出的幼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很低的。他受到双重的心理刺激，一个是眼见母亲为奴婢而受人歧视，一个则出于自身。徐渭是一个生性聪慧而又敏感的人，在这样的气氛中长成，自然容易从自卑的心理中激发出过敏的自尊感，养成偏执而好猜忌、容易与周围环境相对抗的性格。

幸亏嫡母苗氏对他还不错。原来苗氏在嫁给徐懿时，以为徐家军籍近在贵州，没有想到会去山阴。来到山阴后，故乡和老母远隔万里，使她十分牵挂。徐懿死后，留下一个混乱的家庭，尽管她很能干，也不容易对付。因而她对越中的风土人情非常讨厌。她又没有亲生的子女，生活越发显得孤独而毫无寄托。这样， she 就把全部心血和希望放在幼子徐渭身上。因为按照封建礼法，母亲的身份和权力属于她而不属于那个可怜的婢女。苗夫人精心照管着徐渭，在他稍微懂事的时候，就开始教他识字，当他上学以后，更是严格地督促他读书。读书——科举——做官，苗氏给徐渭规划了这样一条传统的道路，这里面也寄托着她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

嘉靖五年（1526），徐渭六岁，开始入家塾读书。启蒙的先生姓管字士颜。管先生很特别，第一天教学生们读的是唐诗：杜甫、岑参、王维与贾至唱和的《早朝大明宫》。虽然这一次唱和因为参与的都是大诗人而成为有名的风流雅事，这一组诗在唐诗中并